

·文献学苑·

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书籍

花家明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 书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它经历了从金石甲骨、简帛到纸本的物质载体的演变,从刻鏤、抄写到印刷的书写形式的演变,从卷束到线装的装帧形式的演变。书籍形式的演变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传播 中国古代书籍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1-0126-05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 in t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Field

Hua Jiaming (The Literature and the News College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book is the main medium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experience changes from book made by bronzes and stones, bone and Jiance to book made by paper, from the engraved and transcribed book to the printed book, book tied-up by cordage to the book bound by stitch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form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Chinese ancien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ulture communication; chinese ancient book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1-0126-05

中华文化能够传承五千年而不绝,并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传播方式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研究的。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使自己的文化“传之久远”,寻求着最佳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体,从古代书籍的演变和传播中就可以看到先民在这方面的智慧。书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它经历了从金石甲骨、简帛到纸本的物质载体的演变,从刻鏤、抄写到印刷的书写形式的演变,从卷束到线装的装帧形式的演变。本文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书籍形式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影响进行探讨。

1 从金石甲骨到纸本书籍

据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很早就有了语言,这时候,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对话、沟通思想、交流经验,这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口头传播阶段。口头传播是最原始的传播方式,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为了方便传播,原始人就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用简练的、便于记忆的语言牢牢记

住,然后再对别人复述出来。由于人类的记忆力有限,一件事经过若干人口传之后,往往会被遗漏或增加某些内容,甚至完全走了样。于是,人们又发明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如“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正是从“结绳记事”、“契木为文”起,华夏先民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文字创造过程。大约在6000年前出现了具有表意作用的文字符号,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约出现于4500年前。

文字是和承载文字的介质连在一起的。最初,石块、树皮、树叶、兽皮、陶片等都曾被用来在上面刻写文字,它们是最早的承载文字的材料。后来,这些用来书写的材料就主要集中在金石甲骨,这也许是先民出于传得久远的考虑。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石刻盟书”、“石鼓文刻”、“摩崖”、“碑碣”等,是中国书籍的胚胎形式。

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化传播的格局,从此开始,在口头传播之外,产生了书面传播,而且,人们对书面传播的重视程度逐渐超过了口头传播,文化传播的内容和范围也有了分野。这时,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一批

人专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 以前的那种传播的全民性不存在了。在只有口头传播的时期, 文化的生产者也是传播者, 传播者也是受传者, 现在, 精神文化的生产由统治阶级掌握, 他们是文化的传播者, 传播者主宰着传播的内容、方式和范围。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的分野使社会文化产生了分裂, 出现了属于统治阶级的官方(精英)文化和属于民间的民间文化, 统治阶级文化的传播以书面传播为主, 民间文化的传播以口头传播为主。

中国最早出现的正式书籍, 是写在竹木简上, 用皮绳编织起来的“册”或“策”。人们将竹木劈成狭长的细片, 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写字, 单支叫“简”, 编连起来就叫“册”, 也叫“策”。据史书记载, 商代已有“简策”之书。《尚书·多士》载周公告诫殷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关于简的长度(据汉代尺), 郑玄《论语序》云:“易、书、诗、礼、乐、春秋, 皆二尺四寸; 孝经谦半之; 论语八寸策, 三分居一, 又谦焉。”简策出现在殷商, 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一直到东汉末年, 才被纸本书籍取代。

春秋之时, 出现了简策的替代品——“缣帛之书”。《墨子·明鬼》篇:“书之竹帛, 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先王寄理于竹帛。”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等书, 就是写在帛上。但帛是昂贵的物品, 不是一般人都能使用的, 只有“先王”和贵族才会用它“传遗后世子孙”。因为数量少, 加上绢容易损坏, 不便保存, 古代用帛的写本, 就很少流传到今天。

简策作为中国最早的书籍形式, 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殷商到西汉, 简策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简策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 正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诸子著书立说, 用以教授学生, 用的都是简策。可以说, 中国古代文化在西周以前是青铜甲骨文化,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 则是简策文化。正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传承过程中, 形成了中华民族。从此以后, 中国就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其子孙后代繁衍生息, 将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她光辉灿烂的文化传播到了今天。

但是, 简策作为书写的载体, 过于笨重, 制作也不太方便, 它不利于携带、阅读和书写。正是因为简策有这些缺点, 人们就在寻找替代的物品, 先是用缣帛, 但它又过于贵重, 不能普及。后来人们找到了可以代替竹简, 具有缣帛的优点而又很便宜的材质, 这就是纸。

我们的祖先在漂丝时, 留下的副产品就是纸的前身。西汉时期, 又以植物纤维造成了纸, 这就是1957年于西安灞桥工地发现的灞桥纸。东汉元兴元年, 公元105年, 发明家蔡伦发明了“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 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 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 用树皮、麻头及蔽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

之, 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从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此后,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中国的造纸术不断提高, 原料也不断扩大, 纸的成本下降, 质量越来越好。

纸的发明, 使之能够代替简, 成为著书抄书的材质。古人谈论纸的优越性, 就是把它和简相比的, 如载于《全晋文》卷五十一的西晋傅咸生的《纸赋》这样写到:“……既作契以代绳兮, 以造纸以当策。犹纯俭之从宜, 亦惟变而自适。夫其为物, 厥美可珍, 廉文有则, 体洁性贞; 含章蕴藻, 实好斯文。取彼之弊, 以为此新。揽之则舒, 舍之则卷; 可屈可伸, 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 离群索居, 鳞鸿附便, 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 精思于一隅。”从文中可见, 纸的作用在于代替简, 其优点是“揽之则舒, 舍之则卷; 可屈可伸, 能幽能显。”而且, 纸在当时用于书信, 十分方便。

东汉末年纸的产量和质量已经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就产量来说, 东汉末年的造纸业几乎遍及全国, 会稽和巴蜀这些偏远地区都已有纸可用。就纸的质量而言,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书法家已经用纸来书写, 如张芝, 其书法作品已经使用纸。《晋书》卷三十六载, 张芝的草书“寸纸不遗, 至今世尤宝其书。”东汉的另一个大书法家蔡邕也已在纸上作书, 蔡张二人都是死于建安以前的大书法家, 他们用纸作书足以能够说明东汉造纸技术的水平和纸的质量已经很高, 能够用于抄书。两汉经学盛行, 东汉后期学经的人数更多, 为求便利, 人们不能不纷纷改用纸书。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东汉末年, 人们想看简书反而变得困难起来, 因此, 郑玄就在《论语序》中作注, 解释简策的制度。种种迹象表明, 到了东汉末年, 中国的书籍已经不再用简, 而是用纸。简策还用, 主要是在政务领域以及契约。简书也还有, 多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在书籍中, 中国人开始与简策告别了。三国时人们所读书早已皆是纸书, 到西晋, 简书就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1]至此, 中国文化的传播进入了纸本书籍传播的时期。中国的纸本书籍从东汉末年开始, 到唐宋定型, 一直传承到今天。

纵观中国古代的书籍, 如果以所用的材料来看的话, 中国古代正式的书籍有三种: 简策、帛书和纸书。帛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和简策并行于世, 一直到东汉末年, 和简策一起被纸书所替代, 退出了文化传播的领域。帛书和简策相比, 轻便、易于书写、便于携带和保管, 但它毕竟过于贵重, 不能普及, 数量极少, 因此, 帛书在中国古代书籍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中国古代的书籍, 主要是简策之书和纸本之书。竹简虽然取材容易, 但制作麻烦, 而且很笨重, 不便携带, 不利传播。而纸却有缣帛的优点, 又比较便宜, 便于普及, 价廉物美, 是书写的理想材料。因此, 东汉末年以后, 在市场上畅行的就是纸本书。纸的发明和纸本书的出现, 对中国文化的生产和传播, 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 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加拿大传播学家伊尼斯认为，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2]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古代的简策当属偏向于时间的媒介，纸本书属偏向于空间的媒介。但在传播领域，媒介并不只是以其物质形式进行传播。媒介的传播是整个社会机体的构成要素，除了媒介的物化形态外，它主要以精神意识的形式在社会中传播，而且，任何一种传播方式都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和其他的传播方式一起协同作用，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和目的。就简策来说，偏向于时间，在当时，简策本身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西周以前，仅限于王室成员和少数贵族，尽管如此，简策文化的传播并不止于此，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文化的传播不是由简策自身来完成，而是通过知晓知识内容的人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进行的，这样一级一级地传下去，最终能使先王“德被苍生，惠泽万民”，才能推行古人所谓的王化之道。这样看来，偏向时间的媒介，在中国古老的传播方式中，在空间上也能传得很远。纸书作为偏向空间的媒介，虽然不能保存得很久，但却易于复制，原本尽管有可能被毁坏，但却可以通过不断的复制而长久地保存下来，这样，偏向空间的媒介在时间上也能够传得很久。

2 从刻楔到印刷

书写方式是书籍形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书籍的书写方式从刻楔到印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口头传播时期，为了帮助记忆，先民曾在木条上刻上记号，这是书写的开端。正是在刻木记事的基础上，产生了我国最早的文字。大约在3000年前的商朝，中国的汉字已趋成熟，并广泛地用来刻楔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殷商甲骨文。从刻楔的角度看，殷商甲骨文是以后雕版印刷的雏形。商朝后半期到西汉制造的青铜器上，也刻有文字，其字体开始接近甲骨文，后来演变成各种不同形体。在石头上刻文字，是上古人类的一种风气。《墨子》中有“镂于金石”的说法，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在石头上刻字已经相当流行。古时候的石刻，一种是将文字刻在山崖上，称为“摩崖”，另一种是将文字刻在矗立起来的长形石头上，长方的叫做“碑”，圆头的叫做“碣”。甲骨文、青铜刻字和刻石都不是正式的书籍，但它们的书写方式是书籍书写的源头，也启发了以后的雕版印刷。古代的帝王也有将儒家经典刻写在石头上的，如东汉的“熹平石经”，这是正式的书籍。

可见，在书籍的萌芽形态，人们主要是用刻楔的方式进行书写的。大概早期的简策也用刻楔进行书写，这种书写方

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大约在春秋时期，就开始用毛笔进行书写了，如“侯马盟书”就是例证。毛笔书写的方式广泛应用在简策上，简策的书写多用毛笔和墨，有时候是先将简编成策，再在上面书写，有时候是先写好了，再编成策。在简上写字，如果写错了，就要用刀将错字削去，因此有“刀笔”之说。这样，简策的书写就要用到笔、墨和刀。

刀笔书写比刻楔书写更具有优越性，它提高了书写的速度，降低了书写的难度。也许在刻楔书写中，书写者和刻楔者不是同一个人，但在简策的刀笔书写方式中，书写者之外就不再需要专门的刻楔者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书籍制作的速度，使精神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刻楔的形式中，精神文化的创造依附在物质文化之上，在刀笔的形式中，精神文化的创造就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它可以脱离物质载体独立存在，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过多地考虑如何将创造的成果刻在石头和其他材料上，和他人合作的必要性降低了，文化的创造带有了个人色彩，这也许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能够兴起的原因之一。

书籍的大量生产为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便利的条件。书籍从一开始是被作为档案、国宝由王室收藏掌管，随着数量的增加，逐渐成为贵族的奢侈品，然后又进入平民家庭，这样，中国文化书面传播的范围和力度就逐渐增大了。

随着造纸技术的出现和成熟，社会上出现了可以用来代替简策作为书籍材料的纸之后，人们就用纸来抄书和写字。书写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刀笔之中去掉了刀，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就只用笔和墨了，因此，汉语词汇中也有“笔墨”之说，如“笔墨官司”。“笔墨”和“刀笔”并行了一段时期，即简策和纸书同时存在。当纸张能够满足抄书和写书的需要后，“笔墨”就成了书籍书写的主要方式，而“刀笔”则只在小范围内存在，这个时候大概就是东汉末年，那时候，普通的读书人就只见到纸书，难以见到简策了。

“笔墨”和纸张结合，书写更为方便，人们写书、抄书、藏书更容易了，书籍进入普通百姓家庭成为现实。社会上书籍多了，书籍的传播和流通也加快了，反过来对书籍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了。用笔墨抄写显然不能够满足社会对书籍的需要，于是，在隋唐，人们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用于书籍生产，以满足社会对书籍的需求。从此，书籍的生产进入了印刷时期。

中国古代的印刷术在大量印制书籍之前就已经存在，它的起源则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的雕刻和转印复制技术。5000年前的陶器制作所用的刻模拍印技术，殷商的甲骨文刻字技术，石刻技术等就已经使印刷术处于萌芽状态了。甲骨文盛行的同时，印章的盖印术也在应用中。西周时期，已采用刻制单个反体字模，用以拼排成完整版面，再铸于青铜

器皿之上的工艺技术,这可以说是活字印刷的源头,如公元前七世纪铸造的《秦公簋》铭文和周末铸成的青铜“奇字钟”就是这种制作工艺的实物证据。中国古代刻石技术的发展,导致了雕版技术的成熟和精湛,也造就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刻工,汉代的熹平石经已经是雕版的前身了。

中国隋唐时期的雕版印书是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实际应用。据东晋葛洪《抱朴子》记载,当时有入山者佩带刻有120个反体文字的黄神越章之印,沿途用它印在泥土上,以防猛兽和恶神,以纸为承印物的雕版印刷可能从这个时候就有了。梁代梁文帝陵前立有两块神道碑,碑上铭文“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左碑为正字顺读,右碑为反字倒读,用以复制碑文,作为纪念品送给前来祭祀的官员。其复制方法,正字为拓,反字为刷,这是以纸为承印物的印刷术。到了唐朝,人们就开始用雕版印书了。明朝史学家邵经邦《弘简录》卷四十六说:“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卅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梓行”既为雕版印行。长孙皇后逝于635年,此书的印行当在这年或稍后。《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记载,太和九年(835)冯宿《请禁印时宪书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可见太和九年以前,已有日历刊行于世,而且传播的范围很大。

从上述史料可知,雕版技术在唐朝进入了推广应用时期,用于书籍生产制作。唐朝三百年中,雕版印书逐渐普及,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府到民间都有了雕版印书机构和工匠。但是唐朝的书籍大部分属于坊刻,主要是为了满足平民的需要。到五代,刻书、印书由民间走向官府,刻书的规模日益扩大,所刻的书门类广泛,除了史书外,儒家经典、释道作品、类书、文学总集和别集等,都有雕刻印刷品。

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最初用的是泥活字,后来又出现了木、铜、锡活字。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因此,活字印刷的出现,也是在文化传播的推动下,为满足传播中对书籍的需要而产生的。与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速度快、用料省、效率高,但是,古人印书仍然多采用雕版印刷,用活字印刷的不多,活字印刷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应用。

刻书印书使书籍能批量复制和生产,这在传播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首先,它使书面传播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将上至皇室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涵盖在书面传播的网络之中。其次,减少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误传现象。在抄写传播中,传抄有可能抄错、抄漏,而印刷因为经过了精细的校对,就能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对世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

有印刷术的推广和应用,就没有现代文明,更没有我们今天的传媒世界。

3 从卷束到线装

甲骨文是单片的,而作为最早的书籍的简策则是用绳子编连起来的。简的装订形式,是用皮绳把竹简编连起来,就像织布一样,用两股绳交织。有的上下两行,有的上中下三行,也有五行的。大概战国以前多用皮绳编制,叫做“韦编”。战国以后,多用丝绳编制,考古发现的楚简、秦简都是用丝绳编制的。简策的开头两简为赘简,正面不写字,在第一根简的背面写篇名,第二根简的背面写书名,起保护简策的作用,这是封面的起源。编制成篇以后,由左向右卷起来,赘简上的书名和篇名就自然露在外面,用绳子捆起来。每一捆叫一“编”或一“篇”。唐成玄英《庄子序》云:“篇以编简为义。古者杀青以为简,以韦为编,编简成篇,犹今连纸成卷也。”用缣帛写的书名“卷”。帛宽约二尺,长短不一,长者丈余,短者两三尺。抄写完一段后,或是折叠起来,或是照编简的方式卷成束,叫做一卷。东汉末年以后,纸张出现,成为制书的新材质,竹木逐渐被淘汰,南北朝时期,竹木缣帛全被淘汰。

纸书有写本纸书和印本纸书之分。写本纸书的装帧形式有三种:卷轴式、经折装和旋风装。卷轴形式通行于东汉至唐朝,是写本纸书的最初形式。它实际上是沿袭了简策和帛书的装帧方式。用木棍作卷轴,以宝石、兽牙、琉璃等镶嵌轴头,将纸书与卷轴粘连在一起,从左至右卷成束。这就是古书演变上的卷轴制度。卷轴写本书从东汉兴起,至东晋末年完全取代简帛,一直沿用到北宋。隋唐时期是卷轴的黄金时期,是卷轴制度发展的高峰。其时抄书风气盛行,有专门代人抄书的“经生”,私人藏书空前增加,书肆也更加发达起来。

唐朝后期卷轴书演变成册页形式的写本。人们不再将书卷起来,而是将它反复折叠成长方形的一叠,在叠纸的前后面各加一张硬纸作保护,看书时就不像看卷轴时那样将书页全部打开,用起来十分方便,这就是叶子书。因与梵文贝叶经形式相同,故称为“经折装”。经折装纸书容易散开,后来有人将一张纸对折,和经折装的首页和尾页粘连起来,就可以回环往复翻阅,不会散开了。这种装帧方式叫做“旋风装”。

印本书的装置方式不同于写本书,用的是册页制度。人们将印出来的许多单页装订成为一册,这就是书籍的册页。最早的册页制度是蝴蝶装,是由旋风装演变来的,大约出现在五代时期。其装订办法是把有字的纸面相对折起来,中缝用浆糊粘在书背上,书衣用厚纸包起来,有时还用丝织品裱褙,这样装订的书像蝴蝶展翅,称“蝴蝶装”,书的内文页一

面有字，一面空白。后来，蝴蝶装得到改进，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就是把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文字面向外，把版口作为书口，将书页的两边粘在脊上，再用纸捻打穿，外加书衣绕背包装。这样页页文字相连，便于阅读。包背装起于南宋后期，元明时期最为流行。明朝中叶出现了线装书。线装书的装置方法是将书纸一页一页地折叠整齐，在书背空白处打眼，穿纸捻，装订成册，然后在书的前后蒙上封面，再打眼穿线装订起来，这就是线装书。线装书是我国古代书籍装订形式的最后阶段。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3]对于媒介形式的选择和运用，对人类传播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所采用的传播媒介和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人的心智结构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信息，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媒介。媒介和社会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它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一

体两面。社会的进步可以由媒介发展程度来衡量，媒介的发展也会进一步促使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在古代时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的传播媒介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的先民为了将文化传之久远，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很早就创造了书籍这一优秀的传播媒介，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不绝地传承下来。

参考文献：

- [1] 刘光裕.东汉末年是否还用“简”抄书[J].编辑学刊,1997,(5):92.
- [2] [加]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 [3]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33.

作者简介:花家明(1968-)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媒介和文化产业。

(上接第125页)漱口,横吞直饮者不知也;井水浓煎,铁器慢煮者不知也必也。山窗凉雨,对客清谈时知之;踟蹰登山,扣舷泛棹时知之;竹楼待月,草榻迎风时知之;梅花树下,读《离骚》时知之;杨柳池边,听黄鹂时知之。知其趣者,浅斟细嚼,觉清风透入五中,自下而上,能使两颊微红,冬月温气不散,周身和暖,如饮醇醪,亦令人醉。然第语其大略,至于个中微妙,是在得趣者自知之。若涉语言,便落第二义。

校记:

(1) 丫山,“丫”原文作“公”,据钱椿年、顾元庆《茶谱》改。^[8]

(2) 伯彝,即“伯夷”,“彝”通“夷”,现在一般都写作伯夷。

(3) “罐”,原书均写作异体“罐”和俗写“確”,本文统一改为“罐”,下不出校。

(4) “间”,原文作“閒”,据钱椿年、顾元庆《茶谱》改。^[9]

(5) “知趣亦不易”,与上句“趣固不易知”义同,后一“不易”的“易”字,似为“难”字之误。

《杭山楼茶略》是在日本发现,国内未见的珍本。该书的写作风格和其他明清辑集类茶书相似。自序和一部分内容是属于陈元辅自己撰写,其余部分基本上辑自它书。该书前面数段,大部分辑录明代钱椿年和顾元庆的《茶谱》。例如“考古”的内容摘自《茶谱》顾元庆所写的“序”;“地气”的开头几句源自《茶谱》的“茶品”;“表异”和《茶谱》的“茶略”相同;“树艺”来自《茶谱》的“艺茶”;“采摘”和《茶谱》的“采茶”大体相同;“制法”和《茶谱》的“制茶诸法”一样;“收贮”的前面几句摘自《茶谱》“藏茶”;“烹点”的茶香、茶味来自《茶谱》的

“择果”;等等。《采摘》的“一叶二芽”,乃是古代不谙茶事的文人的传说,实际只有一芽一叶、一芽二叶或数叶,是不存在一叶二芽的。研究该书内容和写作风格,可知万国鼎先生的推断大体是正确的。该书至今发现仅有日本一个版本,尤显珍贵。本文抛砖引玉,以期更多学者深入研究,传承文明,古为今用,振兴我国的茶文化。

参考文献:

- [1] 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A].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集[C].北京:中华书局,1958:205-239.
- [2] [6] 王华夫.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收藏中国古茶书概况[J].农业考古,1998,(2):279-288.
- [3] 阮浩耕等.中国古代茶叶全书[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617.
- [4] 陈彬藩,余悦,关博文.中国茶文化经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831.
- [5]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13.
- [7] 朱自振.《茶务金载》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化[J].茶叶通报,1999,21(3):47-48.
- [8] [9] 陈祖槩,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124-128.

作者简介:章传政(1971-)男,科学技术史硕士,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读茶学博士,从事茶叶历史、经济、文化研究;朱自振(1934-)男,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教授,茶史专家;黎星辉(1962-)男,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